

澳門中西文化交融四百年的啟迪

徐曉望*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主題。對兩大文化碰撞的結局，世人有很多的憂慮。澳門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東西文化共存四百年的城市，因此，澳門是我們解剖東西文化共存形態的最好典型。從澳門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對21世紀以及更遠的未來——東西文化激蕩的結局作出預測。和大多數人持悲觀態度相反，筆者認為：中西文化在未來的世界固然會有許多碰撞與交融，但它不會導致各自文化的毀滅，而是刺激文化達到更高一層次的繁榮，這已經被澳門歷史上宗教、民俗發展的四百年歷史所證明。

澳門在東西文化交融五百年歷史上的地位

澳門是世界歷史上東西文化交織的焦點。我們知道：自從五百年前葡萄牙人開始探險世界以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開始了相互碰撞與相互融合的進程。在多數情況下，這種碰撞與交融都是在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以西歐國家遍佈世界的殖民地來說，歐洲國家的傳統作法是在這些國家建立殖民統治，並利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傳播宗主國的文化。所以，在幾乎所有的歐洲殖民地，宗主國文化與殖民地的傳統文化之間，都沒有平等的地位。然而，澳門在其中成為一個例外。澳門在四百年前既淪為葡萄牙人的移民地，但是，澳門的宗主國不是移民者的國家，而是被移民的國家——中國。我的這一判斷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在1849年以前，明清兩朝政府一直在澳門擁有行政權、司法權，葡萄牙人僅僅是向中國租用了澳門這一塊地，與中國進行貿易。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成為這一塊土地真正的

主人。這與歐洲人其他的殖民地都不同。在歐洲人的多數殖民地，歐洲人都擁有行政權與司法權，以及相應而來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給他們在殖民地帶來了特殊的地位，因此，他們不能以平等的身份與殖民地傳統文化進行平等的交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他們到來之前，美洲是印地安文化佔絕對優勢的地方。然而，美洲淪為殖民地以後，西班牙人在當地以鐵血傳播天主教，從而對印地安文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天主教嚴厲禁止異教的背景下，無數印地安人的文化寶典被毀滅，乃至世界上僅有三部用古代印地安語撰寫的書籍保留下來。至今為止，人們仍然無法讀懂這些失傳文字撰寫的印地安人的歷史。總之，由於西班牙人以鐵血政策在美洲傳播天主教，造成了印地安古代文化傳統的中斷。但是，造成中斷的原因，並非印地安文化沒有生命力，而是外力的入侵。

如果說西班牙人在美洲導演了一場較為極端的文化傳播模式。那麼，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文化的碰撞是另一種模式。英國人在印度的殖民有三百

* 徐曉望，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

年歷史。他們在印度，沒有實行古代西班牙人那種強迫性的文化傳播模式。他們所提倡的新教，始終在外來殖民者中間傳播，本地土著受其影響的極少。但是，英國人也沒有給印度傳統文化以平等的地位。英國人在印度提倡一種歐洲的生活方式，它吸引了由英國人培養出來的上層階級。在長久的熏陶中，這些人漸漸地形成以英語為中介語言的交往方式，而且，這些人逐漸成為印度的領導者，於是，今天的印度，成為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的國家。這種局面的出現，有印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來自英國一方。由於英國人控制政治權力，他們以此為誘導，最終導致印度上層社會採用英語為其主要語言。進一步影響到他們的中下層社會，迄今為止，英語已成為印度知識份子的主要語言。從印度的漸近式的變化結果來看，印度文化傳統的變遷令人驚心。此處不想評論今日的印度文化，我僅僅想指出一點：倘若不是英國人在印度政治上的長期主導地位，英語不會成為印度人的主要語言。從這一角度看英國殖民地的文化碰撞，可知二者並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的。

與西班牙人在美洲及英國人在印度不同，澳門雖然是葡萄牙人的移民地，但葡萄牙人對澳門，長期祇有使用權，而沒有佔有權。澳門的最高行政權、司法權、軍事權，一向是屬於明清朝廷的。關於這一點，已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論述，此處不再重複。應當說，由於澳門特殊的政治地位，使葡萄牙人在佔領澳門之後，以慎重的態度對待當地的華人文化。作為澳門象徵的澳門媽祖閣，在澳門被葡萄牙人統治的四百年內，一直巍然屹立在澳門半島之上，便說明了葡萄牙人與當地華人關係的一個側面。

1849年以後，清朝與澳門葡萄牙人的關係才開始發生變化。其時，葡萄牙澳門當局運用當時有利於西方的政治形勢，借助於英法等國無形的政治外援，使澳門脫離清政府的直接管轄。但是，這一時代已經與葡萄牙剛剛佔據澳門時的情況發生變化。由於香港的崛起，澳門從一個歐美人在中國唯一的港口，逐漸變為一個廣東地方性的港口。這一變更，使澳門在歐洲的地位下降。過去，澳門是歐洲

人經營中國必到的港口。我們知道：從清代開始，英國法國與美國等歐美國家都到廣州進行貿易，他們在廣州設有商館。然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清朝廷一直限制歐美人在廣州的居住權。他們被迫生活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沒有進城的權力。於是，當時的歐美商人都將澳門當作休閒之處。在貿易的閒暇時期，他們一般來到澳門生活，這使澳門在西方人眼裡，有一種特殊的價值。然而，清朝被迫五口通商之後，原來集中於廣州的貿易逐漸遷到上海等江南口岸；而香港的崛起，更取代了澳門在東方的特殊地位。澳門在清朝已經不是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口，香港的興起，更使葡萄牙人對澳門的地位感到危機。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人更加重視澳門口岸在中國沿海貿易中的特殊地位，也使他們允許中國人口大量遷居澳門。我們知道：從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對澳門的巡視來看，當時的澳門祇是一個居有特殊地位的擁有數千人口的小鎮，以故，廣州人稱澳門為“澳門街”。而在鴉片戰爭以後，澳門人口直線上升，迄至民國時期，已經成為一個擁有十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其實，晚清澳門的發展，已經不是靠其對歐洲的貿易，而是靠當地華人的經濟活動。因此，華人在晚清澳門經濟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人對華人的信仰仍然採取寬鬆的政策。我們知道：葡萄牙人真正控制澳門之後，在政治上抬高葡萄牙人的特殊地位，葡萄牙語成為澳門的官方語言。這是殖民主義不平等政策所決定的。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葡萄牙人沒有延續他們在巴西的殖民政策，沒有將暴力應用在文化傳播方面。同時，澳門畢竟是一個華人佔據優勢的城市，廣東的地方文化對它產生極大的影響。澳門葡萄牙人位於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僅僅保留了一個葡萄牙文化的小島。所以，儘管在政治上有不平等的政策，但在晚清時期，葡萄牙文化與華文文化在澳門的地位，大致相當。葡萄牙文化的地位，除了葡萄牙人自身的存在外，尚表現為政治所造成的特殊地位。而華人文化，其力量表現為人口上的優勢及廣東地方文化的強大影響。

總的來說，儘管有晚清這一段特殊時期，應當

說，在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東西文化長時期共處的區域裡，澳門的特點是：在這一區域的長期歷史裡，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地位大致相當——或者說是較為相當。因此，對澳門四百年歷史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共處歷史的研究，才有典型的意義。

再者，我們還注意到：澳門是歐洲人在東方建立的最早的移民地之一，如果說歐洲人到東方有五百年的歷史，澳門的歷史即有四百年。這類延續四百年並對今天的東方仍有影響的西方移民地，在東方並不多見，印度的果阿是可與澳門相提並論的，但是，它在五十多年前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印度城市，而且，在果阿歷史上，葡萄牙人與印度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他們的關係更類似於一般歐洲人殖民地，而不是類似於澳門，所以，果阿缺乏東西方文化共存的典型意義。

澳門四百年歷史上的東西方文化

在澳門市區裡，令我久久難忘的一個側影是：在雄偉的聖多祿教堂側面，立著一座小巧的那吒廟。在形制上，二者有大小之分，但從二者代表的文化內涵來看，二者卻是沒有大小的。聖多祿教堂代表天主教在澳門傳播的四百年歷史；而小小的那吒廟，也代表著中國民間悠遠的民俗文化。令人驚訝的是二者默默地共存，反映了中國傳統民俗文化與葡萄牙天主教文化共存四百年的事實。其實，這種情況在澳門隨處可見，在媽祖閣的不遠處，即是葡萄牙人的居住區。從葡萄牙人的街區到華人的街區，富有伊比利亞風格的葡式房子與廣東風格的華人房屋遙遙相望，形成了獨特的澳門風情。最能說明澳門東西文化並存的是澳門的宗教。澳門是一個宗教極為發達的區域，小小的澳門市，共有十多座天主堂，而華人傳統宗教的廟宇更不可計數。較大的廟宇有佛教的菩提園、觀音堂；道教的媽祖閣、關帝廟；儒教概念的包公廟等等。除此之外，澳門還有許多世界性宗教傳播，從西方的基督教到東方的伊斯蘭教、印度教，從傳統宗教到新出現的各種教派，凡是世界上各種類型的宗教，在澳門都是應

有盡有。澳門，已是今天的世界宗教博物館。

澳門形成這種世界上所有宗教共存的局面，與葡萄牙人的統治政策有關。在歷史上，葡萄牙人對宗教，基本採取寬容的政策。而這一政策的制定，又與早期傳教士的態度有相當的關係。

我們知道：天主教的傳教士對澳門文化有重大的影響。在澳門開港初期，他們便成為澳門最早的居民之一。天主教士選擇澳門為其傳教中心，與澳門在當時的地位有關。澳門原來的面積僅有十幾平方公里，被稱為彈丸之地。但是，它在中西交通史上，卻有重要意義。在西方傳教士看來，“這個新的居留地，位於那裡多港口的中心，他們在這裡發現了一條途徑，通向不應忽視的傳教活動的新天地。在北面是中國，比寬闊的摩鹿加群島區要大得多，在東面是日本和菲律賓群島，西面是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和其他幾個國家”⁽¹⁾。作為歐洲人在東方最早與最鞏固的據點之一，傳教士們終於選定澳門為其在東亞傳教的中心區域。對他們來說，澳門還是進入東亞第一大國——中國的跳板。來到東方的歐洲人，很早就感到：中國在東亞文化裡的位置遠遠壓倒其他國家。當著名教士沙勿略孜孜不倦地在日本傳播天主教時，日本人經常問他，中國人對天主教的看法如何？這使沙勿略感到：在東亞傳播天主教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人的信仰。如果作為東亞思想策源地的中國能夠改宗天主教，那麼，天主教就一定能在東亞其他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各個國家與區域獲得成功。在他的引導下，羅馬教會將中國作為傳教的主要物件，而進入中國，其主要途徑是從澳門進入廣州。因此，澳門成為他們向東方傳教的中心。它曾經建有遠東最早的大學——聖保祿學院。來到東方傳教的西方傳教士，諸如利瑪竇、艾儒略等人，都要在澳門停留多年，他們在這裡學習東方的語言，等待進入中國及周邊國家的機會。因此，澳門很自然地成為許多著名傳教士在東方一定要停留的地方。為了更好地在中國傳教，他們還在這裡學習與研究中國文化，這使澳門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達到較高的水平。此外，我們要注意到：當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都受過精良的知

識培訓，他們雖然算不上歐洲的一流理工人材，但他們對歐洲的自然科學都有相當的理解。由這樣一批傳教士代表的西方文化，達到了當時西歐文化較高的水平。這使澳門異於一般歐美移民佔據的地方。

澳門的四百年歷史中，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能長期共存，與早期傳教士的開明思想有關。早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以耶穌會的利瑪竇最有影響。也可以說，是他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基本格局。利瑪竇對中國已有傳統思想的評價很有意思。在他看來，中國的儒學是世界上所有思潮中最接近基督教教義的一種思想文化體系。在原始儒教中，有上帝的概念，而這一上帝，似乎和基督教的上帝頗為相似。再如，儒教重視家庭倫理，強調三綱五常，而這一些概念，基督教並非不能接受。其實，基督教也相當重視家庭倫理的建設，在這方面，基督教在東方尋找到了同盟軍。在他看來，中國人的原始儒教相當接近基督教的原始教義，祇是由於宋明理學家的影響，儒教開始偏離原始教義；其次，由於佛教、道教等多神教在塵世中的喧囂，中國人的思想開始變化，與原始儒教漸行漸遠。利瑪竇認為：向中國人傳教，並不要推翻中國人固有儒教，而只要將其修正，便能成為真正的基督教。關於利瑪竇由此產生的在中國的傳教策略，不是我們這一篇文章的主題，就此略過。我們所要說的是：利瑪竇的思想在歐洲影響極度大。它使歐洲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人懷嫉一種莫名的好感。在這一背景下，歐洲掀起了中國熱，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被傳入歐洲。這使歐洲人改變天主教對待異教一貫的嚴厲，而能夠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待東方的思想。我們敘述這一文化背景，似乎繞了很遠，其實，我們要說明澳門葡萄牙人對中國人傳統思想的寬容，離開不了對這一時代歐洲大背景的分析。由於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對中國傳統儒教的定位，使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對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也較為寬容。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傳播的歷史上，曾經有一段鐵與血鑄就的歷史。當時的傳教士，是基督教義最堅定的捍衛者，他們曾經用刀劍與火刑來對待與天主教士對立的人士。不管任何人，祇要被判

定對基督的信仰不夠堅定，便會遭到宗教法庭的制裁。自從文藝復興以後，西方人對等異教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從將異教徒當作敵人，逐漸發展為能夠理解與接受與異教徒共存的事實。葡萄牙人正是在這樣一種風氣中來到了東方，而耶穌會恰恰又是西方對東方文化最為寬大的一批人，這是澳門出現寬容氣氛的文化背景。正是有了這一背景，澳門的葡萄牙人對當地中國文化採取一種寬容態度，便有了思想上的立足之地。

葡萄牙人對華文化寬容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澳門的主權仍然屬於中國。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租地能維持四百年，其實是他們所不敢想象的。不論是明朝政府還是清朝政府，都曾多次設想過收復澳門，他們之所以未將它付諸行動，是因為澳門的存在，使明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多一種很實利的選擇。它是海禁時代廣東地方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其次，在明清兩代的朝廷中，都有天主教傳教士及他們的同情者在活動，他們千方百計為澳門的葡萄牙人緩解，終於渡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由此可見，雖然葡萄牙人在澳門長期存在，實際上，他們始終感到來自明清朝廷的巨大壓力。為了保住澳門的地位，以便保持在對華貿易中獨特的位置，葡萄牙人不得不收起來自西方的傲慢，小心翼翼地對待明清朝廷。許多西方的遊記表明，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看來，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商業地位雖然值得羨慕，但葡萄牙對中國朝廷方面，也付出了犧牲尊嚴的代價。明白了葡萄牙人在明清兩代的地位，我們便可知道：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享有特權，其實，他們並非在澳門享有一切權利。澳門作為一個仍在廣東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城市，華人的利益理應得到尊重。由於這一緣故，華人在澳門一直保有相當的權利。然而，由於澳門的直接行政管理屬於葡萄牙人，華人在澳門的地位，也不可能超過葡萄牙人。其實，華人在澳門的實際地位還是比不上葡萄牙人的。總之，二者之間的地位，不是平等，而是大致相當。

由於上述原因，在澳門四百年歷史上，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長期共存，構成了一種奇異的文化現

象。葡萄牙人在他們的社區過著與歐洲同胞相似的生活。而華人在自己的社區按照千百年以來的傳統生活。葡萄牙人沒有設想去改造華人的生活方式，華人也沒有設想去改造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由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堂與中國人建立的廟宇，共同屹立在澳門這一片土地上。

文明的共生共存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

回顧一百年前的世界，我們會覺得世界變化了很多；回顧五百年前的世界，我們會覺得世界變化得實在太快。未來世界會怎樣發展，各國的未來學家都有許多憂慮。這是因為：過去的人類，祇能在狹小的範圍裡生活；然而，隨着人類交通條件的改善，人類往來的增多，原有的生活格局肯定要發生變化。而在新生存格局裡，傳統文化如何生存？這是人們感到憂慮的。

以美國來說，過去的美國號稱種族大熔爐，來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達美國之後，逐步融入美國。在這一國家，所有的移民都以一種改變的英語講話，都為美國而驕傲，所以，他們實際上形成了新的美國民族。他們之所以那麼快地加入美國，其實與當時的交通條件有關係。當時的歐洲與美洲相隔浩瀚的大西洋，交通既不方便，來往亦不便宜。大多數人來到美國，實際上就斷絕了返回故鄉的希望。因此，他們祇有融入當地社會一種前途，沒有第二種選擇。由於移民不斷地融入美國，美國人有了一種自成一體的驕傲，他們可以一種聲音對世界說話，並團結一致捍衛自己的利益。但是，今天世界的交通已經相當方便，民航機穿梭於世界各地，並成為大眾交通的一種選擇。在這一時代的移民，不會完全割斷與故鄉的聯繫。而且，由於他們往往成群結隊地移民某個國家，會在新的國家形成自己的文化圈。例如，對美國而言，來自拉美的移民已經成為美國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拉美國家長期講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其中，主要是西班牙居民移民美國。他們利用與美國接壤或相近的優勢，運用各

種方式移民美國，並在美國形成自己的生活區。在這些生活區裡，他們仍然講着自己的語言，以傳統的生活方式生活，他們甚至將西班牙語帶入學校，在自己的社區學校，用自己的語言教學。這種情況從二戰後延續到今天，美國人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將他們融合，於是，他們產生了憂慮：美國是否會在外來入侵文化的影響下迷失自己的傳統文化？是否有一天，美國人大夢醒來，突然發現美國已經不是傳統的美國？美國未來學家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即反映了美國人的這種憂慮。

其實，亨廷頓的憂慮來自於文化上的傳統偏見。對於歐洲人與美國人來說，他們習慣的狀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亨廷頓正是出於這種偏見，才會坦率地說出他的憂慮。但是，他的這一觀念早已是過時的觀念。一個國家是否祇能有一個民族？是否祇能有一種文化？我們若將這一質疑向亨廷頓當面提出，不知他會怎樣回答？然而，對於東方民族來說，這一問題早已有了回答：一個國家可以有多個民族，可以有多種文化並存！東方的歷史上，一直有多民族的國家並存，他們可以和平共處。其中，中國是最典型的例子。澳門歷史的價值在於：它不僅說明東方的民族之間可以長期共存，而且，西方民族與東方民族也可以長期共存，並且各自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一個已經被歷史驗證的真理。

未來的世界各民族肯定不會像古代社會那樣純之又純，大規模的人員交流，必然帶來大範圍的人員雜居。不論是什麼民族，都會有混居的狀態出現。但是，這並非意味民族文化的末日。因為，在新的定居區，仍然會有各民族自己的選擇，並形成自己的社區。這些社區，將延續各民族自己的傳統文化。祇要他們自己珍視自己的傳統，這種傳統便能延續到永遠。

這就是澳門四百年歷史的啟示。

【注】

- (1) 《利瑪竇中國笈記》，第2卷，第2章，何高濟等譯，中華書局版，頁141。



自梳女（亞慳布油畫 220 x 150cm） 林永康·1999年作品

此歷史畫作品獲第九屆全國美展銀獎。它反映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搖籃的廣東在19世紀中期出現了“自梳女”這樣獨特的社會群體。正是這些從封建宗法桎梏中掙脫出來的勞動婦女，以及星羅棋布的繅絲作坊，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南中國的萌芽。在當年混沌的歷史中，她們可能對未來感到一片茫然，但是她們留在歷史的身影卻是無比清晰的。